

理论学习参考

2021年第12期

(总第98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专刊(九)】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宣传部编

2021年5月6日

目 录

【党史知识】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大事记 1

【品读经典】

“增强十少，避免十多”——重温毛泽东1961年批阅的《调查成灾的一例》 12

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读《朱德调查研究文集》 17

【党史研究】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诞生记 20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贫困的思考和努力 24

毛泽东为什么关注解放思想、走出“新路” 31

向“五多”宣战——1953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47

由对抗走向两国关系正常化 51

【平“语”近人】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57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59

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 60

【重要论述】

党史上的这一周(4月26日至5月2日) 61

编者按：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整理汇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系列专刊，供学习参考。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大事记 (1949-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的时间、地点、事件简介进行归纳，方便理清历史的脉络，把握重大事件。

一、新中国成立

时间：1949年10月1日

地点：北京

简介：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

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二、抗美援朝

时间：1950年10月-1953年7月

地点：朝鲜

简介：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日，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三、“三反”运动

时间：1951年12月-1952年10月

简介：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开展“三反”斗争。“三反”运动历时半年多，于1952年10月结束。这场斗争，是党在执政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清廉、惩治腐败的初战，清除了干部队伍里的蛀虫，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对抵制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和健康的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

四、“五反”运动

时间：1952年1月-1952年10月

简介：1952年1月，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界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和进行民主改革，为后来用和平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重要铺垫。

五、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时间：1954年9月

地点：北京

简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变革，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指明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

六、“三大改造”完成

时间：1956年底

简介：随着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宣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有步骤地向前推进。其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相当一段时期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办法，不仅有利于资本家接受改造，而且能继续发挥私营工商业在扩大生产、搞活流通、维持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

七、中共八大

时间：1956年9月

地点：北京

简介：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大会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坚持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肯定“三个

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

八、“大跃进”开始

时间：1957年

地点：全国

简介：1957年冬季，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

九、整风运动、反右倾扩大化

时间：1957年

地点：全国

简介：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后来指出，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

6月，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进行批判。但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使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遭受挫折。

十、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

时间：1958年

地点：全国农村

简介：在“大跃进”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农村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跃进”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际上是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搞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十一、庐山会议

时间：1959年7月-8月

地点：江西

简介：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要改过来。他还提出读书、形势、工作任务等19个问题要大家进行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出现了意见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印发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时，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许多人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此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此后，会议发生转向，开展所谓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但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一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十二、开发大庆油田

时间：1960 年

地点：黑龙江大庆

简介：1960 年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批准石油部党组关于“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的建议，决定集中力量在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自 1960 年 5 月开始，集中全国石油部门的人力、物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到 1963 年，大庆油田的油产量达到 600 万吨，国家投资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并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

十三、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时间：1961 年 1 月

地点：北京

简介：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作的《关于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作的《关于 1960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通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十四、七千人大会

时间：1962 年 1 月-2 月

地点：北京

简介：为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1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作了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虽然会议未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十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时间：1964 年

地点：西北

简介：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整，在我国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重视科学技术、果断决策的结果，更是凝聚了广大科技工作者智慧和辛劳的结晶。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发展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1962 年 11 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协同攻关，大大加速了“两弹一星”研制进程。原子弹研制率先于 1964 年实现突破。1966 年 10 月 27 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爆炸，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十六、提出“四个现代化”

时间：1965 年

地点：北京

简介：1965 年 1 月 4 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在今后建设工作中，进一步认识建设的客观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5 年 1 月 4 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和完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和任务目标。

周恩来提出，要在 20 世纪内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从此，四个现代化成为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宏伟目标。

十七、“文化大革命”开始

时间：1966 年

地点：全国

简介：“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 5 月 4 日至 26 日在北京召开。5 月 16 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十八、“二月逆流”

时间：1967 年 2 月

地点：北京

简介：从 1967 年 1 月起，“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2 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

十九、八届十二中全会

时间：1968 年 10 月

地点：北京

简介：到 1968 年 9 月，全国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无政府状态。10 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二十、中共九大

时间：1969 年

地点：北京

简介：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还选举了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 1969 年 4 月 28 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

二十一、尼克松访华

时间：1972 年 2 月

地点：北京

简介：文革后期，中共开始考虑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中美之间展开秘密谈判。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2 月 28 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十二、中共十大

时间：1973 年 8 月

地点：全国

简介：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开。在大会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修改的党章，选举了由 195 名委员和 124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党的十大以后，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二十三、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时间：1975 年 1 月

地点：北京

简介：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 月 17 日在北京举行，2885 位代表出席。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号召。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使得身处反复动乱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

二十四、全面整顿

时间：1975 年

地点：全国

简介：1975 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经过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照“四五”计划基本完成。

二十五、“文化大革命”结束

时间：1976 年

地点：北京

简介：1976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10 月 6 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 月 14 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十六、中共十一大

时间：1977 年 8 月-12 月

地点：北京

简介：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党的根本任务是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二十七、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时间：1978年5月

地点：北京

简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二十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时间：1978年5月

地点：北京

简介：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决定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大事记》）

“增强十少，避免十多”——重温毛泽东 1961 年批阅的《调查成灾的一例》

1961 年初，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的号召，得到了全党的积极响应，“调查研究之风”在党内盛行起来。但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个别地区和单位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将《调查成灾的一例》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

1961 年 5 月 1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就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写好一份材料，以《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为题，上报中央。材料指出：在这些调查研究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

(1) 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2) 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3) 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4) 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5) 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6) 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7) 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8) 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9) 带走的東西多，留下的东西少。(10) “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

5 月 28 日，毛泽东批阅了这份材料，给材料拟了一个新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批改调研材料，给材料冠以更加准确、醒目的标题，以引起全党的注意，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领导方法。毛泽东批示，将此材料印发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仅仅这样，毛泽东似乎觉得还不够。过了两天，5 月 30 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再次作出批示：“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他指示，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

在毛泽东看来，材料所列举的调查研究的弊病，都是他一贯反对和强调避免的。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有一系列完整、系统、准确的论述，防止“调查成灾”，就是要在实践中全面贯彻这些方法。

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

毛泽东历来主张，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干部要亲自作调查研究。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在《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等文中就提出：“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毛泽东向全党重提《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评论道，“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经验了，知道不能单靠书面报告！”

听汇报看材料是调查研究的一个方法，毛泽东并没有否认这一方法，只是他认为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更为重要。“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领导干部浮在上面听取的汇报，阅看的材料，往往由于层层润色而造成信息失真，因此，“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不仅如此，还“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只有通过亲身的调查研究，牢牢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所作决策才会真实可靠。

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调查研究要求领导干部走出机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强调，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杜绝高高在上，昂首望天。只有谦虚谨慎才能联系群众，才能深入群众。

他教育领导干部：“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

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出现群众不讲真话的情况，不能怪群众，只能怪领导干部自己没有放下身架，平等待人。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态度决定调查研究的成效。调查研究的对象是群众，领导干部不能平等待人，群众和领导干部就会有隔阂，就不会讲出真实的情况。他以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兴国和长冈、才溪两乡向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调查为例，深有感触地说，这些人，“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领导干部与群众处于对立的状态，是断然调查不到真实情况的

领导干部这种平等的态度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有真正实现“三同”，群众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干部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相待，才愿意全力支持和积极配合，才能够无所拘束地讲出真实情况。革命战争年代，党长期处于农村的环境中，几乎天天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执政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客观上减少了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条件，久而久之就容易造成脱离群众的危险。领导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出现“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以工业部门为例，严厉指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领导干部与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是断然调查不到真实情况的。

要做周密详细的准备，切忌漫无边际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一直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同样，他也坚决反对没有充分准备就盲目作调查研究。以开调查会为例，毛泽东提出要事先花费充足的时间准备调查提纲，开会时按纲目发问。“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

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在开会前要准备好几个备选方案，跟被调查的人讨论、研究，到底哪个方案好。“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参加调查会的人员，需要调查人根据调查的内容进行选取。原则是要请那些能深切明了社会情况的人。为了保证调查的全面、真实、准确、科学，“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充分地收集、占有各种相关报纸、刊物、书籍，“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当然，相关材料搜集得愈多愈好，“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调查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任何贪图享受和走捷径的想法与做法是一定做不好这项工作的。领导干部要想获得真实情况，一定要精心谋划，细心准备，深入实践。否则，即使是深入基层，也必然是盲人摸象，走走过场，上演串串门、认认人、照照相、招招手等群众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

不为解决问题的调查研究毫无意义

调查研究不是目的，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毛泽东曾对二者作过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十月怀胎”完全是为了“一朝分娩”。他始终强调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不为解决问题的调查研究毫无意义。

民主革命时期，对“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年代里，毛泽东和高级干部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调查研究仅仅停留在收集资料上，有调查而无研究，就不会形成思想和观点，“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到了许多新奇的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因为“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充分地占有材料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要进行更加艰苦的工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在

这个基础上，“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的弊病。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掌握正确的方法，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至关重要。学习并正确运用科学的方法，调查研究就会事半功倍。反之，不懂得方法，或者方法不对头，调查研究就会事倍功半，抑或徒劳无功，甚至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更为严重的是会导致脱离群众，失去民心。

（作者：王明波，广西区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北京日报》 2018年3月19日）

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

——读《朱德调查研究文集》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不顾年事已高，长期坚持调查研究。在二十多年里，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深入生产一线了解经济建设情况，深入群众之中感受百姓生活状况，并认真写出调查报告，及时向党中央反映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生动地展现了他在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的情况。这里，仅对书中朱德关于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的思考做一些探索性梳理，供读者参考。

应通过改善民生来调动群众积极性。朱德曾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不靠发展经济建设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他还指出，如果不给群众增加福利，群众是不会关心生产的。要使群众的生活逐年有些改善，才能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下来，并得到发挥。1954年1月，他在大连中苏造船公司调研时，针对工人中出现的“劳动纪律不很好，旷工还多”等问题指出，旷工人数中，30%是因为“公司的福利办的还不很好，有些影响，比如看病，挂号从半夜等到天亮，第二天就不能上工”；10%是因为“对工资不满”；0.5%是因为“家里有事”；约有10%是因为青年工人搞恋爱。据此朱德认为，解决旷工问题，既要“加强劳动纪律教育”，也要“适当地改善工人福利状况”。

要考虑和照顾群众的实际利益。1957年1月，朱德视察广西时，了解到当地土特产收价低、售价高、税目繁多等问题，提出在税收方面应作适当的减免，使农民有利可图，同时对收购价格也应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有赚有赔、不赚不赔和以赚补赔的扶植方针。1957年4月，他视察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后指出，南方山中杂树灌木很多，应有领导有计划地允许群众采伐一部分，并规定采一根栽两根，这样才会刺激起群众育林护林的积极性，不致把山上有用的东西都封死。1962年3月，他视察浙江、江西后，针对“农民除完成必须的交售任务外，对其他农副产品，不愿意卖给国家”的现象指出，“原因是卖掉农副产品后，买不回所需的工业品来”，“农民对国家的希望是等价交换，有来有往。现在农村的农副产品是相当丰富的，但必须用工业品来交换”。所以，

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特别是日用品和锅碗瓢盆、砖瓦石灰（群众迫切要求修改房屋）的生产。

副业生产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1954年3月，朱德针对华南地区副食品减产的情况，建议通过宣传教育等办法，消除群众的错误认识与顾虑，动员群众大量饲养家畜家禽。饲料困难的地区，应研究解决的办法，多方开辟饲料来源。1957年2月，他就海南岛大部分农场赔钱的问题指出，国营胶园应该特别注意多种经营，如养猪、养牛，种咖啡、香茅、剑麻、菠萝等。在目前胶树幼小的情况下，必须以副业来养正业。如果这样，国家不仅不需要什么投资，胶园还可以更加扩大。1957年5月，朱德批评东北林业生产没有充分利用副产品的问题，“仅是黑龙江每年可产桦树皮五千万斤、松子一千万斤、木耳二百万斤，还有许多珍贵野兽、毛皮、药材等。此外，树子、树叶、树根、锯末等还可以制成国内外畅销的油脂、酒精、人造纤维等一百多种工业品”，他提出：“如果把林区适当开放，允许地方和农业合作社有组织地把这些现成的东西拿出来加以利用，就可以大大增加人民的收入，增加出口物资，为国家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

要重视山区的开发和建设。朱德非常关心山区群众的生产生活，认为山区开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1957年2月，他就海南岛山区土特产品收购问题指出，把山区物资运出来，不仅仅增加了财富，同时也救济了山区人民。所以，对土特产和出口物资的征税，应采取免税、减税以至由收购方面纳税的办法，以鼓励群众多多生产，换取外汇。1957年4月，他视察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后指出，目前山区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山区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单靠农业贷款和民政部门救济还不能解决问题。应该看到，通过外贸系统从价格政策和各个方面来使山区经济获得发展是当前解决山区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是可以做到双重利益的。

住有所居对安定人心有重要意义。朱德常说，要鼓动农民自己盖房子、搞家具，这样人心就稳定下来了。家庭巩固了，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更好地前进。1955年7月，他视察内蒙古后强调，“一定要符合经济、实用的原则”，一切非生产性的建筑，应实事求是，从当地条件出发，向老百姓学习、看齐，并应就地取材，注意防风、保暖（如设

土炕等），宜矮小不宜高大，坚决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法，这就可以在充分发挥因地制宜的潜在力量、尽量节约国家资金的原则下，修造出为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大量的房屋。1959年6月，他视察黑龙江后强调，无论城市和乡村，今后应该鼓励群众自己建筑房屋。“黑龙江最近提倡建房储蓄，并准备供应群众一部分木材和玻璃，这一措施是很好的。这一方面可以鼓励群众成家立业，做到安定人心；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农村购买力对日用品的冲击。”

管理工作要方便群众生活。1959年6月，朱德视察辽宁后，了解了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长年食堂的原因后指出，“东北冬季时间长，各家都需要烧炕取暖，如果食堂和家里立两炉火，浪费很多煤火”，“食堂设备条件差，不能做到家里那样饭热炕暖”，“自留地分下去后，在家里做饭，可与饲养家畜家禽结合起来”，“群众感到在食堂吃饭，对来人待客，婚丧嫁娶诸多不便”。他明确指出，让群众在家里做饭好处甚多，最主要的是群众的生活由群众自己掌握。群众对于自己的粮食安排，向来是有计划地食用，细水长流。1962年5月，他视察陕西、四川后，针对“集市上的饭铺小吃等都没有了，农民赶场买不到饭吃，觉得很不方便”的现象指出：“我和农民谈话，他们说，愿意赶场时自己带上粮食换吃的。因此，我认为可以允许私人或者供销社在集镇上开几家饭铺，国家不供粮食，只是由农民自己出粮食吃饭。这样既养活了一部分人，又便利了群众。”

朱德的这些真知灼见，不仅在当时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而且对我们今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学习时报》 2017年3月15日）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诞生记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封锁。当时，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现代工业不到国民经济的10%，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且相关人才匮乏。如何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共和国领导人殚精竭虑思考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酝酿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51年2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已开始谋划大规模经济建设问题。2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了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设想。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开始编制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邵文6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这项工作。

编制五年计划，是学习苏联经验的做法。关于采取这种做法的目的，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讲得清楚：“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

然而，由于旧中国留下的统计资料很不齐全，国内资源状况不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都缺乏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经验，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且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短时间内没有确定下来，“一五”计划只能采取边计划、边执行的办法，不断修订、调整、补充。

“一五”计划编制过程

1951年5、6月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粗线条的试编。

1952年7月，中财委试编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简称《五年计划轮廓草案》）。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

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带着草案征询苏联政府的意见，并与苏联商谈援助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问题。斯大林两次会见中国代表团，“肯定地回答愿尽力之所及予以帮助”，并对草案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认为发展速度最好留有余地，建议把20%的工业年增长率降到15%。

1952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并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1953年6月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为编制“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

1953年6月，国家计委结合苏方意见和援助情况，对《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进行了初步总结和修改。例如，将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由20%下调到14%至15%，并要求加快发展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

1954年，毛泽东下了“军令状”，要求从2月15日起，用1个月零5天时间拿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粗稿。在陈云的主持下，3月20日完成粗稿，4月初拿出《五年计划纲要（初稿）》。毛泽东认真审阅了初稿，逐行逐句圈点，作了许多批注，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审阅。同月，中央成立了编制五年计划纲要的8人工作小组，加快“一五”计划编制工作。

1954年6月底，陈云就五年计划纲要初稿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重点阐述了编制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即“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原则。他说：我国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平衡包括财政收支平衡、现金收支平衡、外汇收支平衡、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平衡。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都要按比例发展。

10月底至11月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先后离开北京到达广州，用近一个月时间，在那里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进行仔细地审议修改。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要把三峡工程列入计划，但

按我们国家现在的物力、财力，又不能列入五年计划，只能列入长期计划。我是看不到了。”这时，他对在场的邓力群说：“将来建成时，写一篇祭文告诉我。”

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11天的时间，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又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随后，中共中央将这个计划草案发给中央各部委党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讨论，并要求各省委特别注意本省的农业发展计划。

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至此，“一五”计划历时四年之久、五易其稿，终于编制完成。

编制“一五”计划的经验

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全面提前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有135个项目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项目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我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制造等。我国中部地区建立起一大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化工和军工企业，构成我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说，“一五”计划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五”计划的成功经验主要有六条：一是注意从国情、国力出发，确定工农业生产增长指标既积极又稳妥；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势；三是注意做好综合平衡，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四是在经济发展布局上，努力改变历史形成的我国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五是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六是既争取外援，又强调自力更生。

从“一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已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在编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时，我们不能忘记新中国走过的每一步，不能忘记在怎样的“家底”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一五”计划留下的许多宝贵经验，仍然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作者：王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毛泽东思想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一处处长、编审
《旗帜》 2020年9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贫困的思考和努力

摆脱贫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一直是毛泽东的夙愿。中华民族是带着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耻辱进入 20 世纪的。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是近代中国的主旋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毛泽东在领导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做了极大努力。

找到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源

1949 年 7 月，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艾奇逊认为中国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多地少，是客观条件决定的，是哪个政府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毛泽东则以革命实践为基础，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艾奇逊的言论。他指出，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

毛泽东看到了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源是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主张通过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来解放和提高生产力。1950 年 6 月，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而要完成这一中心任务，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继续完成全国农村的土地改革。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经反复讨论修改，于 1950 年 6 月 28 日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从 1950 年冬天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解放区开展起来。土地分配的原则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庙宇、寺院等在农村中的土地，除依法收归国有者外，其余统一交乡农民协会，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对地主也分给同样的一份。

到 1952 年底，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3 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 7 亿亩土地，并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 700 亿斤以上粮食的地租负担。

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亿万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劲头空前高涨。他们起早贪晚，积肥打井，添牛买马，精耕细作。1952 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 3278 亿斤，比 1949 年增长了 44.8%。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新中国的反贫困事业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建立中国消除贫困的制度保障

土地改革后，多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虽有改善，但由于资金、耕畜、农具缺乏或劳动力不足，扩大再生产仍有许多困难，更经不起天灾人祸的袭击。为了克服一家一户生产所遇到的困难，真正造福农民，毛泽东又要求打破小农经济的桎梏，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3 年 9 月 25 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了由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实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1953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正式向全国发布，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毛泽东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消除贫困的唯一正确出路。他认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必然产生两极分化，工人和农民将重新回到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中去。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证。毛泽东强调：“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在办合作社的过程中，一个叫王国藩的普通农民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接见。1952年，河北遵化县西铺村的王国藩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初级社。起初，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不属于入社的农民，因此人们把他们的初级社叫作“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但是，正是靠着“三条驴腿”，靠着不服输精神，这个穷棒子社拧成一股绳，埋头苦干，在第二年就发展到83户，粮食亩产从120斤增长到300多斤。

1955年，毛泽东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按语中，他充分肯定了王国藩的穷棒子社：“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到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基本上完成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尽管存在着速度过快、方式过粗的问题，但是农业合作化，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广大农村建立起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实现了中国土地的公有化。此后，通过合理规划土地，进行大规模水利灌溉和农田基本建设，推广机械耕作、施肥、杀虫等农业科学技术，我国农业的生产条件大为改观。同时，从1953年起，我国逐步对个体手工业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人数的91.7%，基本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起，我国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底，实现公私合营的工商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商业总个数的99%，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成为新中国消除贫困的最大优势和最坚强保障。

制定中国消除贫困的战略

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的成立，虽然为中国工业化创造了基本前提，但是年轻的共和国所面对的是一个饱受战争破坏的烂摊子，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当时，现代工业不到国民经济的10%，全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加上工

业建设经验不足，相关人才缺乏，西方国家的孤立封锁，新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举步维艰。

在毛泽东反复审阅修改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到共和国领袖当时的思索和心情。《提纲》写道：“根据苏联的经验，要想在较短时间内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化就应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从建立重工业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 50 至 100 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我国也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必需的装备，才能自己制造火车头、钢轨、货客运汽车、远洋轮船和飞机；才能自己制造轻工业的精密机器，扩大和建立新的轻工业；才能生产农业机器和化肥，改造古老的农业；才能建立现代国防工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

基于国情，毛泽东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反贫困战略。

建设重工业不仅需要的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而且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这一客观现实，要求人们在工业化起步阶段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不宜搞重工业，应多发展轻工业，并呼吁政府“施仁政”。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 1953 年 9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他指出，现在，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不能照顾小仁政而妨碍大仁政。

三大改造完成前后，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认真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提出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问题。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发展重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统筹协调发展，并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才能使整个

国民经济得到较快较好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由此，工农并举、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开始形成。

努力解决民生贫困问题

毛泽东反对只追求经济发展不顾民生的做法，主张适当安排、统筹兼顾，注意照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利益。他总结苏联的教训，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毛泽东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在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解决人民群众的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实际问题。

针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当得知一些孤寡老人生活困苦时，毛泽东批示：“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1954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医疗卫生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此毛泽东多次做出批示。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此后，大批城市医务工作者下乡，为农民送去医药。巡回医疗队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1968年，毛泽东批转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在全国掀起农村合作医疗的高潮。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在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把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称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教育深刻影响人的发展，也是反贫困工作的基础。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的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明确提出：“推行识

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由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1955年，毛泽东又强调：“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在毛泽东的推动下，1964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52%，实际上降低了因教育致贫的概率，激发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使之成为反贫困事业的主体力量。

正是由于毛泽东心系民生、重视民生，新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

设定中国消除贫困的目标

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制度变化。但是，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还不可能很快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毛泽东希望早日消除贫困，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并因此时常流露出急迫的心情。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与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牛皮来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又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毛泽东摆脱贫困的愿望越来越迫切，领导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设想以更大更高更纯的公有制形式让全国人民都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结果事与愿违，因脱离了实际，工农业生产大幅下降，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这时，他只好放缓脚步，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济形势才逐渐好转。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发表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反复强调国民经济发展要搞综合平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思想。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谈到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问题。他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已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将军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次年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庄严宣告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两步走”战略部署。尽管“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遭受了一场浩劫，但毛泽东一直没有改变这一目标，直到他去世。

中国的反贫困事业，无疑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毛泽东是中国反贫困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战略，带领亿万人民朝着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发起最后的总攻。当我们在2020年底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时，将可以告慰毛泽东等革命先辈：“这盛世，如您所愿！”

（作者：王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毛泽东思想
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一处处长、编审
《湘潮》 2020年第6期）

毛泽东为什么关注解放思想、走出“新路”

在回应新中国与旧政府的区别时，毛泽东曾经以“我们已经找到新路”作答，这是毛泽东从民主政治建设角度探索社会主义“新路”的一个基本思路和重要结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关注有关解放思想、走出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系列问题，强调既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的老路”，也不能走苏联“走过的弯路”，同时在探索“新路”中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等。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关注探索“新路”，究其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内在精神要求；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实践发展要求；四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中产生的内生动力需求。

一、问题的引入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接续回答时代之问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到道路自信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展望这条道路时所强调的：“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一个认识基点。走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路”，并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整个历史过程的理论思考方向和实践探索方向。

在毛泽东研究中，学术界经常展开关于“新路”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毛泽东提出的走一条人民政府与旧政权区别的“新路”角度着眼的，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如何跳出历代统治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问题。问题的起因，是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

考察延安期间,向毛泽东提到的“历史周期率”。当时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就是从走出“新路”的视角回答他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毛泽东从民主政治建设角度探索社会主义“新路”的一个基本思路 and 重要结论。对这个问题大家已经熟知,这里不再赘述。本文着重谈的,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特别关注有关解放思想、走出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系列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事例切入。

二、“走出条新路”——有关机关干部走革命化“新路”的事例

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从干部队伍建设角度极为关注干部教育、干部培养“走出条新路”问题。带领人民建设好社会主义,党的干部自然是成败的关键,起着模范带头作用和示范引领作用。路往哪里走,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来引领。对这一点,毛泽东历来极为看重,干部建设和干部培养教育问题,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

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格外注意党内干部的引领作用和决定性作用问题。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特别强调:“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他特别看重干部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明确、坚定和执着的态度。在我们党制定的政治路线中,既包含着这个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向、基本遵循,也包含着这个党开创新局面、创造新事业的基本要求。这些遵循和要求,都与思想路线密不可分。也可以说,思想路线彻底确定以后,党的干部才能真正起决定性的作用。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共产党人思想路线”这个概念时,就规定了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内涵,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在阐述这一内涵时,毛泽东专门

批评了一些干部那种“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反对“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的“一种保守路线”，号召大家“速速改变保守思想”。自那时起，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开拓创新，就始终居于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核心内涵中。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仍然特别注意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要求党内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在实际工作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开拓创新，不容忍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干部缺乏朝气、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

在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中，党的干部如何始终保持革命化，“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这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196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总编室编印了一份内部参考材料，题目就叫“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其中反映：黑龙江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这份材料指出：“有的过去长期蹲在大楼里，不闻春秋的干部，成天意志消沉，思想空虚。到农村后，呼吸了新鲜空气，暮气被打掉了。”还提到，一些下基层的干部表示：“思想上很快起了变化。过去总是教育人的，现在是受教育，心情不一样，感受也不同。”“有千个变化，万个变化，感受最深的是由干部到普通劳动者、由‘官’到民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才真正触及了灵魂，不论你‘官’有多高，锄头镰刀一拿，官架子就打掉一大半了。”这份材料认为，基层群众需要的是这样的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和群众一条心；下到基层后，“由于干部的思想得到改造，贫下中农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贴心人”。这份材料反映问题的关键，是机关干部革命化的方向，即：走出一条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与基层群众紧密结合的“新路”。

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后，感触颇深。他历来反对干部或“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或形成“一种保守路线”“保守思想”，或成为脱离群众的“官老爷”。他当即作出批示：“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并要求《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样的材料。

几天以后,《人民日报》于10月5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还在按语中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要求:“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广大干部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有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新老革命干部,要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毛泽东看重的这条干部建设和干部教育“新路”,核心是提倡干部亲身参加劳动,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使自己不要脱离劳动人民,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青春。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均说明毛泽东在新中国、新社会的干部建设、干部教育的方向性问题上,始终有着全局性、战略上的高度警惕;他对党的干部能否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有着深刻性、具体化的详细安排。他极为注意的是,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不能养成剥削阶级的坏作风,必须面向基层、面对群众、面向实际,保持朝气蓬勃之锐气、创新发展之精神。

三、“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有关提倡唯物辩证法和敢于破旧创新的事例

探索新路,就不能思想固化,更不能思想偏离。在这方面,毛泽东从“老将”要“向小将们学习”、运用好唯物辩证法角度极为关注社会主义事业“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问题,实质关注的是不能走向歪路和偏路的问题。带领人民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我们党需要始终保持一种开拓前进的革命精神。革命时期,我们党勇于开拓、善于斗争,向生动的实践学习、向一切新生事物学习,敢闯新路、敢为天下先;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依然需要保持闯劲和拼劲,不能畏首畏尾、缩手缩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提倡要在尊重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敢于创新,不能陷入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能因

循守旧,更不能回到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立场上去。在这方面,他经常抓住一些典型材料,教育和引导党内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

1964年9月28日,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运动员徐寅生在一次经验交流会上讲了他关于打好乒乓球的经验和体会,他特别讲到自己在实战中琢磨出了一套开动脑筋、克服难题的辩证法,还讲了如何敢于学习和善于学习等问题。这份看似不起眼的年轻人的总结讲稿,却一石激起千层浪。总结讲稿先是引起了国家体委领导的高度重视。10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看到徐寅生这篇讲话稿后,非常赞赏并批示,批语点明了徐寅生讲话中的辩证法问题,强调在思想上和时时事上,都要与实际相结合,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要敢于破旧创新,不搞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此外,还指出了这些道理的“普遍意义”。

这篇“小将”的讲话稿和贺龙的批示件于1965年1月12日送到毛泽东案头,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对此他作了长篇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当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毛泽东批语的最后,简而言之以否则“我们就要完蛋了”的口气来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其中透露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强烈信息:一是要求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阅读;二是要求高级干部开完会后回到自己所在的部门或地方,“再加印发,以广宣传”,让全社会知晓;三是要求“一大批老将”要主动向“小将们”学习;四是进一步向全党提倡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五是引导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行业、各领域都要积极主动地“向小将们学习”,否则就会停滞不前。这些提醒,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毛泽东对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种忧心和紧迫感。

毛泽东批示这两份文件的时候,正值中共中央集中高级干部开会期间。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性工作会

议,这是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调整后,中国经济走出低谷,逐步摆脱困境,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走向正常轨道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事关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毛泽东忧虑的,正是这条道路不能转到右的方向上去,不能走向“老路”或“邪路”。

这次会议形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通称“二十三条”。这份文件对全国基层的政治形势特别是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作了过高的、“左”的估计,提出要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问题,在指导思想上也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但文件的出发点,是要纠正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从上到下存在的右的倾向,警惕党内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足,对“和平演变”问题了解不够,对依靠和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站位不准等情况。文件强调的几个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党内同志要认清我们搞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防止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二是要“逐步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逐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三是基层要注意发扬民主,“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四是干部在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上,“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五是在思想方法上,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等等。

按理说,“打乒乓球”的材料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无关,但毛泽东却要求所有与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不仅学习其中的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而且点明了“我们这一大批老将”面临的“挑战”。毛泽东借“打乒乓球”的材料,意在提醒党内干部注意:讲的虽然是打球,但我们“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他强调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问

题,是有关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问题。一旦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出现思想认识偏差,就会在实践中走向错误,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在“可靠性”上出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讲,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议党内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向小将们学习”,也是在思考“新路”问题。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面对着许多未知领域,党内干部中也存在着情况不明、规律不清、能力不足、困难巨大的挑战,必须不断开拓创新,特别需要在实践探索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反对各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如果僵化保守,不向新人新事学习,事业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四、“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有关破除迷信、尊重科学的事例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毛泽东基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需要树立高度自信的思考,极为关注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消除自卑问题。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在实践中遵从客观规律,尊重科学、破除迷信,同时克服自卑感、树立自信心。

自20世纪50年代起,毛泽东不断地讲尊重科学、破除迷信的问题,他强调:“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归纳起来,毛泽东讲到人们容易从四个方面产生迷信:一是迷信国内某些事、某些人;二是迷信外国某些事、某些人;三是迷信自己熟悉的还活着的当代人;四是迷信已经死去的古代人。为此,毛泽东特别提醒人们:“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毛泽东则一方面强调要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提出不能完全迷信,要与时代同发展。他提醒党内同志:“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提倡破除迷信、尊重科学,敢于质疑权威,不盲从偏信,这恰恰反映出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特质,充分体现他的理论自信。

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时,毛泽东认为最需要打破的是对西方事物和西方人的迷信,克服中国人自近代以来产生的不同

程度的自卑感。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后,在总结建设经验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提到中国人要树立自信心、消除自卑感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他着重提醒人们:“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剖析的东方人的“自卑感”,实际上主要源于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东方的掠夺、压迫,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华民族的奴役、摧残。这种心理造成了中国社会许多人心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不自信状态。对此毛泽东在提出反对迷信问题时,特别强调要反对迷信一些西方帝国主义的东西,引导人们树立自信心。他说:“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只有几亿。”毛泽东坚信,在破除西方迷信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一定会比西方人“干得好些”“生活得更好些”。正如他在创建新中国时所预言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树立起的自信中,首先要树立起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充分自信。在这方面,毛泽东多次强调并作过专门论述,特别指出不能迷信西方政治制度和所谓民主。他指出:“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

当然,在破除迷信的时候,不能把什么都当迷信“破”掉了,更不能破除科学真理。毛泽东指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他认为,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破除迷信并不影响我们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等非迷信的东西。“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它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它们的设备等。”他旗帜鲜明地告诉人们,自己反对西方的是些什么东西:“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

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遗憾的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性意见,在实践中运用时也出现过一些偏差。不过,他一旦发现便立即给予纠正。他举例指出:“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为此,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和对错误倾向的纠正,都是在探索中深化的,无论是破除迷信还是保护真理,都伴随着开拓创新的实践探索。毛泽东深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比探索已经走过的革命道路更加复杂,不能一切从本本出发、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甚至对“老祖宗”也不能迷信,唯有从思想上破除迷信,才能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开创新局。

五、“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有关探索强国新路的事例

毛泽东从尽早建成“现代化强国”角度极为关注“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不能重复苏联“走过的弯路”问题。要使中国从贫穷落后下富强起来,一方面需要在一穷二白基础上一点一点地摸索积累;另一方面也需要打破常规创新发展。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毛泽东格外关注“走新路”的问题。他在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时明确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打破常规,不走老路,探索新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尽快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强国,这就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扛起来的历史责任,也是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基本思路。走新路,从技术上讲首先就要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发展的模式,从战略上讲还要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存在的弊端,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自身条件和特点的建设路子。

如何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难题。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是一边探索、一边总结经验，中间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总能自觉地不断校正自己。为反思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集中起来专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在读这本书的系列谈话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思考。

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设想：“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这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目标分两个阶段的明确设想。

二是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并更为具体地明确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各国特色问题，即各国自己的不同形式和方法问题。他肯定地指出：“‘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他在读书谈话中对“照抄苏联的办法”进行了反思，肯定中国必须走一条“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路子。

应该说，探索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点，找到社会主义建设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相互统一，这是毛泽东孜孜不倦的追求。早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坚持走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路子。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也一再强调各国要有社会主义的不同形式、要有各自的不同特点。他认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

当然，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我们的确参考过苏联的“路子”，借鉴过苏联的经验，但是，从全局上最早察觉苏联“路子”具有明显弊端的领导人，也是毛泽东。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审慎地研

究苏联的经验教训,并思考了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如何处理“十大关系”问题。他明确警示党内同志:“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应该说,毛泽东对苏联经验教训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这一反思也是在提醒中国同志不能再重走苏联的“弯路”。这对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起到了巨大的警醒作用。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也就成为党内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理成章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方针且能够深入人心。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在评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时,特别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清楚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其逻辑起点正是来自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探索。

六、“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有关根据实践发展写出新著作、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例

毛泽东基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角度思考,极为关注“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束之高阁的一般性的理论知识,而是用于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革命实践的生动智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这一理论的归属恰恰就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实现远大理想。这样的理论,必定是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解决不断出现的复杂现实问题而不断创新发展的。正因如此,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历来极为重视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在实践中创新发展。

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他始终坚信:正确的理论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并积极地指导着实践,“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他历来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反对

思想上的僵化保守和理论上的故步自封,并提醒人们“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的问题时,尤其关注其中“创造”的内在要求。他曾经说过:“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面对全新的社会实践领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意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一是从思想上深入学好悟透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主动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毛泽东认为,要想在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中进一步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他举例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说欧洲的革命要来了,结果革命没有到来。”他还举例指出,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预言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好多国家同时进行,并且还要在资本主义最先进的文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但“结果并不是如此”。所以毛泽东提醒大家,无论在革命还是在建设问题上,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又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时,他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正因为强调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人民群众在实践探索中涌现出的创新做法和鲜活经验,并亲自加以推广;同时,特别注重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上升到认识高度进行理论总结。

由于主客观复杂原因,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思想上的困惑和实践中的曲折。每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总是引导党内同志沉下心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反思和总结我们所走过的

路,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号召党内高级干部组织有关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学习小组。他自己也亲自组织了一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小组,在边读边议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学习“老祖宗”和发展“老祖宗”的问题。他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这次谈话,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点要求:一是“创造新的理论”;二是“写出新的著作”;三是“产生自己的理论家”。

“创造新的理论”,讲的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在灵活运用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总结出创新经验、赋予其鲜活的内容、提炼出新的思想论断,从而创造新的理论内涵。这种理论创造,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写出新的著作”,讲的是既要学习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又要根据实践发展写出新“本本”。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提炼出新观点,谱写出代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水平的新论著。

“产生自己的理论家”,讲的是既要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有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实践探索总结,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前提下把马克思主义推上理论高峰,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晶和思想成果,培养出自己的思想家、理论家。

毛泽东自己就是根据这三条要求去做的。他历来反对躺在“老祖宗”身上、“单靠老祖宗”而停滞不前、不思进取。他曾经从理论著作发展的角度,以自己写过的著作为例提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的共产党人,

都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解决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同时写出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新著作,形成自己的新理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境界。

七、毛泽东不断提倡解放思想“走新路”的原因

引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走的就是一条有别于其他国家一般社会发展进程的新路;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探索出的一条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路。走好这条“新路”,从根本上就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而实现创新发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有苏联已经走过的路子可以部分借鉴,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中共也不是苏共。无论革命道路还是建设道路,一路走来,都警示我们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路子,必须探索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模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中勇于开创新局面、善于探索新路径。探究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关注走出“新路”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找到一些答案。

首先,探索新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马克思主义自从传入中国以来,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始终具备与时俱进的内在发展逻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与时俱进地实现创新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毛泽东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赋予过它“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根本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不断在前进中开创新路,同时也在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中提升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获得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活力。这一思想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开拓进取永无止境、创新发展永无止境。

第二,探索新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内在精神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之所以不断得到巩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能够启迪和引导中国共产党人实现自我革新和自我革命,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进一步改造客观世界,不断引领人

民一步步提升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一方面,在领导人民不断开创新局面的道路上,我们党需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另一方面,在前进的道路上,中国人民也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同时不断完善和巩固我们的社会制度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概括的:“中国人民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革除阻碍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充分显示了制度保障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我们这个党、这个民族的内在精神状态。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党无精神不壮。事实证明,我们党越是长期执政、中国人民越是自强奋进,就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鼓舞我们不断探索新路,不断实现超越。

第三,探索新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实践发展要求。社会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具有光明的前景,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能够不断引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并通过一步步实践探索和扎实奋斗走向发展新阶段和新高度。未来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征途上,实践是发展的,探索也是不断前进的。自新中国成立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定地引领着祖国富强、民族复兴的创新发​​展道路,尽管在探索中经历了一些挫折,但积累了进一步创新发展的宝贵经验。不断开拓创新,接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共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的重大责任”时,曾从创新角度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四,探索新路,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中产生的内生动力需求。社会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感召力,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指导共产党人坚定地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

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有着不断走向新生活、不断朝着幸福生活新境界迈进的现实需求和内生动力。毛泽东曾经坚定地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其目的就是要真正地为人民谋幸福，不断创造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美好图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的重大责任”时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一表达，正是承继了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满足人民群众利益方面的创新和创造性追求。

抓住了上述几个主要原因，就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关注解放思想、走出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问题。当然，毛泽东晚年从创新发展方面探索“新路”的思考和实践，也存在一些主客观上的偏差甚至错误。因为要探索新路，就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前进的道路上就会充满荆棘和泥泞，所以在一些问题上毛泽东也不由自主地陷入理论和实践的困境，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好好地汲取。

（作者：杨明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局局长、
研究员 《毛泽东研究》 2021年第1期）

向“五多”宣战——1953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往往互为表里、相伴而生，且具有长期性、反复性。1950年至1955年间，中国共产党结合陆续开展的整风、整党、“三反”、新“三反”和整顿编制运动，先后进行了五次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1953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从整治区乡工作中“五多”入手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其中比较突出、集中的一次。

两份报告呈送中央，毛泽东亲拟两件指示下发全党

1952年冬，来自中共山东分局和西北局的两份报告先后呈送中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山东分局的报告说，此前开展的“三反”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县、乡基层组织仍明显地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作风问题，表面上看工作步步推进，但实际上没能有效纾解群众的实际困难，省政府甚至积压了7万多件群众来信没有处理，给党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西北局的报告则集中反映了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看似处处留痕，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人浮于事、顾此失彼。

针对山东分局报告，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并于1953年1月5日下发全国，要求各地结合具体情况查摆问题，先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切实整改。3月，毛泽东又指示将西北局报告转发各地，并亲自起草《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指出所谓“五多”实际上是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并要求必须在1953年内结合1月5日关于新“三反”的指示对“五多”问题进行深入整改。

短短3个月内，毛泽东连续两次亲自拟定指示，严肃要求全党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各地迅速展开调研，发现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确实突出

根据中央指示，各地迅速展开专门调研。不出中央所料，“五多”问题在各地基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脱离实际的任务多。比如某地区委书记报告说，区委每 10 天左右只布置两三项工作，但区长、专署干部，以及党、农、青、妇、文教、合作、银行、税收等各“口”总是层层加码布置十多项工作，且往往要求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此，区乡干部怨声载道：“自上而下一级逼一级，自下而上一级怨一级、一级哄一级。”

会议集训多。不少地方在组织群众、布置工作时形式固化、机械，动辄召开群众大会，眉毛胡子一把抓，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秩序。比如，华北局报告反映，有的村庄一个月内竟召开 28 次群众大会，各种大会名目繁多，甚至卖豆饼、贷款、卖酒、储蓄、保险等也要依靠开大会解决。

公文报告表册多。各地省属单位、县市和乡镇在制发调查表格时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各机关各自为战，使得各种日报、三日报、五日报、旬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等泛滥成灾。调研发现，某地农村基层组织一个季度内竟要填制二三百种统计表格，“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基层干部群众苦不堪言。

组织多。比如，西北局调查组发现，陕西咸阳某乡的十余个自然村中，每村不仅有村长、农会主任、居民组长、互助组长等职务，而且治安、卫生、优抚、防堤、资保政险、保史畜鉴、合作、防旱、护林等村民小组各设组长，各类组织林林总总竟多达 20 多种，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积极分子兼职多。彼时，各种“生产竞赛”和“比学赶帮”滋生一些负面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各种先进称号名目繁多，各类劳模、标兵、代表、积极分子等常常身兼数职，往往整日忙于开会和先进事迹报告，结果是脱离生产、脱离群众、顾此失彼，反而损害了先进形象。

“五多”现象的实质是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分散主义。各地的情况陆续报到中央，毛泽东阅后深刻告诫全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作风问题会导致党政干部“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远一点的下情”，若长期得不到纠正，其结果就是引起农民群众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

结合具体工作，毛泽东亲自指导整治“五多”

为集中克服“五多”问题，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党中央立即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以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市委及各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对“五多”问题加以清理。3月20日，即整治“五多”指示发出的次日，毛泽东就叮嘱各部委负责同志，“用中央名义批发的电报不要太多了，非十分必要者不要批发”。6月20日，毛泽东批示转发西北局关于整治“五多”问题的报告，指出克服“五多”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级党委应当将整改“当作一种经常的注意事项，不断检查、不断改进”，主要是“反掉错误的制度和领导方法，随时建立起正确的领导制度和办法，并使之巩固下去”。

由于“五多”中的每一“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具体到各地情况又不尽相同，毛泽东多次强调，各地整顿要结合具体工作，结合自身实际。5月23日，时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杨士杰在提交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当时农村统计报表过多过滥的突出问题。毛泽东阅后称这份报告“极好”，并于7月22日将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具体情况，“迅即仿照华北局的办法对于统计报表问题指定专人加以调查分析，分别宣布停用、保留和改进，并规定简化报表及控制报表的可行办法，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同时结合“五多”中其他几方面作全面整改。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还围绕当时农村正在逐渐铺开的互助合作多次强调，农村各项工作要在保障农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的基础上立足实际、循序渐进，推进“五多”的整改要结合具体工作，切不可过多干涉、粗暴命令，以防滋生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风气。总的来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之下，1953年各地围绕克服“五多”弊病展开了有的放矢的专项整治，对以“五多”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良作风进行了有力的纠正，进一步巩固了新“三反”运动的成果，基层逐渐呈现政简民勤的新气象。

知古鉴今，整治“五多”给我们的经验启示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需要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更需要刀刃向内的政治魄力和不折不扣、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就决定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

坚持解决突出问题与推动中心工作相结合。1953年中央结合新“三反”集中整治“五多”，就是抓住了当时干部群众意见很大的突出问题作为切入点，并且注意结合农村的具体工作实际，方才取得良好成效。这启示我们，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紧密围绕中心工作，以推动中心工作为着力点和抓手，寓作风建设于落实各项具体工作之中，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坚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命令主义、分散主义、事务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错误作风是密切相关的，也具有反复性、顽固性，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保持常抓的韧劲、长抓的耐心。

（作者：李炼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旗帜》 2020年第6期）

由对抗走向两国关系正常化

毛泽东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作出了“美国要跟中国建交”的战略预见。毛泽东指导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方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坚决斗争，以斗争求缓和；二是以我为主，等待时机。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毛泽东通过乒乓外交破局，推动了中美关系由对抗状态走向两国关系正常化。

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对于当今两国关系基本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美国对华采取不承认政策；一年后，双方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进入对抗状态；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共同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对抗”到“正常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 22 年后取得了对美外交工作的突破性成果。

战略预见：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美两国处于对抗状态，毛泽东却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大格局，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作出了“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的战略预见。

1955 年 5 月底，在与印尼总理阿米佐约探讨即将到来的中美谈判时，在 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会议期间，在 1957 年 1 月 27 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在 1958 年 6 月 16 日与二十余位驻外大使会谈时等，毛泽东都表露出尽管美国现阶段“不承认”新中国，但是，“总有一天，美国是要与中国建交”的乐观前景。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指出：“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规划中国发展的开端盛会。报告中关于“中美建立友好关系”的表述，无疑是新中国向世界、向美国发出的明确和平信号。

毛泽东对中美建交的可能性时机，也作过多次预判。以 1957 年 1 月 27 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为例，毛泽东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以苏美建交是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后 17 年为参照，提出：“我们跟

美国建交，可能要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 18 年或者更长时间。”以 1957 年起，经过 18 年左右，为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如此算来，毛泽东对中美建交时间的预判，是基本准确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选择在 1950 年代中期作出关于“中美建交”的战略预见？

最直接的动因是 1955 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启动。1955 年春，中美双方都有意向通过谈判，缓解台湾地区的紧张形势。1955 年 8 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会谈有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实际问题。从 8 月 14 日到 9 月 10 日，双方达成了遣返平民的协议。9 月中旬进入第二项议程后，美国采取纠缠拖延的做法，中国代表提出的禁运问题等议题均被美方拒绝，会谈陷入僵局并一度中断。虽然会谈没有解决中美双方的实质性问题，但是在那个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有助于双方互相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对缓和两国的紧张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智者见于未萌。有了中美大使级会谈渠道的建立，毛泽东并不指望中美之间的对抗能在一夜之间消除，但有理由相信两国对抗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

应对之道：一是坚决斗争，二是等待时机

1956 年 9 月 30 日，毛泽东同到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谈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话题自然就引到了中美关系上。毛泽东说：“对付美国人是耍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第二是不要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以 1964 年约翰逊当选总统为分界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美国政府意图通过“遏制孤立”政策，颠覆中共政权；后一阶段，美国政府转向“遏制接触”政策，目的是遏制中国“扩张”的同时避免直接军事冲突。毛泽东的应对之道，在前一阶段，侧重坚决斗争，以斗争求缓和；在后一阶段，侧重以我为主，等待时机。

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美国对新中国采取“遏制孤立”政策，政治上不承认，军事上威胁，经济上禁运。面对封锁包围，新中国没有屈服，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上下一心，坚决斗争，上演了一出成功的突围大戏。

对于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还千方百计影响其他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举动，毛泽东作出回击，实行“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明：但愿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开展交往。中国的呼声，得到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响应，在较短时间内，有 26 个国家对新中国表示了外交承认。新中国的第一次建交高潮，意味着美国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共同阵线”的图谋，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随后，新中国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和 1955 年亚非会议等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朋友圈越来越大。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9 月，美军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很快突破“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朝鲜政府紧急请求中国出兵。毛泽东反复权衡，为此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最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毛泽东认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从 1950 年 10 月到 1951 年 6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五次大的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战场的僵局，让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两年多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1953 年 7 月 27 日双方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对于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立国之战、止战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尊严，也打出了几十年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美国的“遏制孤立”政策还有经济上的封锁。除了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往来，新中国探索出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经贸活动的渠道。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新中国与锡兰签订以大米换橡胶的政府贸易协定，帮助锡兰度过了橡胶危机。中国和锡兰的经济贸易，开创了中国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开展贸易的先河，其他亚洲国家也先后同新中国做起了生意。中国与日本的经贸来往则始于民间，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签订了 4 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利用外交场合，新中国积极推动与西欧国家的经贸关系。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组织了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成为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在中英贸易关系发展的带动下，法国、瑞士、联邦德国、挪威等国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中国同西欧的贸易有了较快增长。对于美国主导的经济封锁，

新中国就这样撕开了一道道裂口。

从杜鲁门政府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再到只执政 2 年的肯尼迪政府，一直坚持僵硬对华“遏制孤立”的政策走到了尽头。此时，在越南战场，美国介入程度加深。为了避免与中国在越南重演朝鲜战争的一幕，约翰逊政府感到有必要改变自 1958 年第 2 次台海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冻结的“隔空对抗”状态，需要对中国执行更灵活的政策。由此，“遏制孤立”政策调整为“遏制接触”政策：在政治遏制的同时，在人员、信息和物资的交流方面放松限制。从 1964 年起，在有限次数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绝大部分的讨论只不过是双方重申人所共知的立场而已”。美方坚持它有义务援助南越以恢复和平，无意威胁中国，并谋求中国协助美国解决越南问题。中国的反应则是指责美国侵略，斥责美国行为所造成的威胁，拒绝谈论干涉越南内政的问题，坚持美国应该撤出。在会谈中，中方向美国明确传递“底线”信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扩大战争，中国将奉陪到底。甚至严厉警告：如果美国“将‘中华民国’引入越南从而将中国的内战与它的侵略战争联在一起，那么等待着美国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在两国关系中，越南战争并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要害在于台湾问题。新中国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要求是：废约撤军，即废除 1954 年 12 月 2 日在华盛顿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走驻扎在台湾的全部军事力量。面对中国的正义诉求，美国却一直把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同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国内问题相混淆，要求中国承认美国对台湾有所谓“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此外，美国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援和经援，美国政府一直在试图搞乱台海局势。

中国在 1964 年 10 月成功爆炸的原子弹，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使中国有底气在谈判桌上更加强硬。在越南战场上，中国给予了北越尽可能多的援助，甚至做好了出兵准备。整个 60 年代，中国的对美政策都没有表现出多少弹性，美国企图集中讨论其他问题的做法，一概为北京所拒绝。毛泽东的坚定立场是，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获得解决以前，其他问题都不可能出现有意义的对话。新中国并不急于与美国接近，也不急于获得被视为“美国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反华舞台”的联合国代表席位。

破局一招：小球推动大球

1969年，中美接近的时机出现了。“小球推动大球”成为毛泽东在推动中美破冰的时点上，使出的破局一招。

1969年3月，珍宝岛的枪声，触动了毛泽东。6月，毛泽东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进行研究。四位老帅连续开了6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形成了三份厚厚的书面报告。在报告中提出：对美苏的斗争，要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正急于拉中国，我们可以从战略上利用当前形势，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毛泽东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美国为了化解来自苏联的战略压力，同样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美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近，过程也是一波三折。1969年12月，在波兰华沙的时装博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外交人员主动找中国外交人员传递美国想要修好的信息。尼克松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中国传递口信：想来中国，同中国领导人会面。然而，由于美军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拒绝了美国的“示好”。

推动中美破冰的关键支点，竟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赛后到中国访问的愿望。中国外交部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提出拟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建议。对此，毛泽东考虑了三天。最后关头，他由不同意改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国际舆论称这是“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尼克松从这场“乒乓外交”中受到鼓舞，正式向中国方面传递口信，表示准备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认真商谈，并提议由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特使，先期到北京会谈。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机飞到了北京，在北京只停留了48个小时。10月20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与中方商讨尼克松访华时将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周恩来同他会谈了10次。会谈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两国贸易问题、越南战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问题。美国表示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再支持“台湾独立”，这意味着美国表态不再执行“两个中国”政策，而中国则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和时间表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允许美国不是一步到位地满足中国提出的条件，而是分阶段地逐步撤出其在台力量，逐步减少其对台影响。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如期访华。在下飞机的一刻，尼克松快步向前，主动伸出手来与周恩来握手。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寓意深长地对尼克松表示：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当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表示：具体的问题，尼克松可同周恩来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正式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美方明确“一个中国”的原则，并确认了从台湾撤军的最终目标。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尼克松感慨地说：“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稍显遗憾的是，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在1974年8月被迫辞职，中美建交问题被拖延下来。直到毛泽东逝世后的1978年12月，中美两国终于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数十年前，毛泽东作出的“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的战略预见，被证实了。此后，围绕美国对台军售问题，1982年8月17日，两国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成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石。

（作者：李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前线》 2019年11月）

平“语”近人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的古代典籍和经典名句为切入点，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阐释与广泛传播。我们选取了《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以来的“总书记原声”和“经典释义”等内容，供学习参考。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一、总书记原声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个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

二、经典释义

这是201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讲话。讲话当中他强调了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总书记引用了一句古文：“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这句话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守仁所讲。王守仁有一个很有名的另一个名字，叫王阳明。王守仁这句话出自他的《教条示龙场诸生》这篇文章。

“教条”就是信条；“示”是宣示的意思；“龙场”指龙场驿，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今天贵州省的修文县；“诸生”是指在龙场驿跟随王守仁学习的弟子。所以，这篇文章它实际的意思是王守仁写了一篇告示，教导所有在龙场驿跟他学习的弟子，要必须遵守的几个信条。这几个信条中间的第一条就是讲的立志。立志的第一句话就是讲“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那么王守仁为什么会在偏僻的龙场驿写了这篇告示的呢？这个原因是缘自一封奏疏。原来是明武宗继位以后，不理朝政，而把大权给了

当时的宦官刘瑾。所以，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就把持了朝政。这件事情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首先是顾命大臣、大学士刘健上疏，要求明武宗罢免刘瑾。结果明武宗听不进去，反倒把刘健免职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近乎白色恐怖的朝堂之上，当时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出来了。王守仁就给明武宗上了一道奏疏，提出来要罢免刘瑾，而且要处死刘瑾，所以这件事情更大程度地激怒了明武宗。所以明武宗就下令，把他贬到今天贵州省的修文县，也就是当时的龙场驿担任驿丞，一个很低微的小官。

所以王守仁到了这里以后，写出了这篇公文。王阳明是一个把志向看得非常重要的人。他 12 岁的时候，王阳明问他的老师，天下第一等要紧的事是什么？老师认真地考虑了一番告诉他，读书、科举、做官。王阳明不认可。王阳明认为，天下第一等要紧的事是做圣贤。所以王阳明从 12 岁就立下做圣贤的壮志，他一生无论是在困境或者是在顺境之中，他始终坚守这个理想，坚守这个信念，坚守这个志向。

王阳明用他一生的思考和实践，告诉我们，欲成大事者，必立大志。而这个“立大志”的背后就是伟岸的信仰。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总书记原声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二、经典释义

这段话中总书记一共六次用典。在此只解读其中的一条，也就是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建兴六年，也就是公元 228 年，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章表，要求这个冬天再次北伐。因为蜀汉始终以汉朝的正统自居，而公元 220 年，曹丕已经称帝，所以北伐讨伐这个曹魏政权就是蜀汉政权的一项政治任务。诸葛亮在出发之前，给当时的后主刘禅写了一封章表，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后出师表》。

在《后出师表》中间，诸葛亮讲了一段名言，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意思是什么呢？我只能恭敬地履行自己的使命，一直到死为止。至于这个北伐战争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困难还是顺利，这是我所无法判断的。诸葛亮的这个话，表达了一代贤相为了国家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而为了国家利益英勇献身的献身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不光有诸葛亮，还有刚才总书记讲话中，还提到了文天祥。文天祥有过一首很有名的诗，叫《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这首诗同样地表达了他的献身精神。我们要学习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的献身精神。同时的话，还要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汲取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正能量。

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

一、总书记原声

“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这是龚自珍讲的。“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失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

二、经典释义

这段话出自总书记在2016年1月12日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总书记引用了龚自珍的两句诗，“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

龚自珍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的诗人。他生活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道光七年，龚自珍在北京写了一组诗。这一组诗全部是古风。所谓古风，就是相对于平仄格律非常严整的格律诗来说的。他一共写了15首古风，题目叫《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题目很长，就是说从道光七年的春天到秋天，他在北京城里边有很多感触，他把自己的感触拉拉杂杂地写下来了。当然这个“拉杂”是一个谦称，龚自珍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诗人。他说我拉拉杂杂写了很多诗。然后把这些诗，没有按照一个什么逻辑顺序编起来，所以叫“漫不诠次”。最后得了多少首？得了十五首。其中的第一首就有两句：“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古人认为，人的这个心是管着思考的。这个观念实际上是错误的。我们今天知道，思考是在大脑中间完成的，心脏是一个供血器官。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沿用了古人把心当作思维器官的这样一种功能的使用。所以，在龚自珍这首诗中间，就写下来这么非常有名的两句。“寸心”是指心之小，“苍穹”的本义是指天空，是指天之大大。那么大的一个客观世界，靠什么去战胜它？去掌握它？靠心。只有能够战胜自己心中的欲望，只有能够正心养性，才能够战胜客观世界。只有你的心正了，百毒才不会侵身附体。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第二季第二集）

党史上的这一周

(4月26日-5月2日)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选取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党史百年·天天读》栏目中的“重要论述”，集中展现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供学习参考。

一、4月26日

1939年4月26日

朱德致电陈光、罗荣桓。电报指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是我坚持华北抗战与争取政治影响的重要方针之一。此次敌对华北各地区之“扫荡”气势逐渐发展，以城镇为据点，以图根本肃清我军或根本危害我之存在与活动。估计此种毒计实现不可能。我以较多兵力继续在平原坚持游击战，仍有可能亦为必须。非万不得已时我各区部队不应轻易离开根据地。

1948年4月26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谭震林关于淄川、博山、张店、周村的情况及所取之政策报告的批语。批语提出企业管理委员会应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指出：这个报告在说到企业的正式管理委员会时，只说由经理、工会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须知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

1987年4月26日

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谈到什么叫社会主义和怎样搞社会主义问题。他指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

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二、4月27日

1945年4月27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社论指出：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这些副产物就是：（一）改善官兵关系。（二）增强劳动观念。（三）增强纪律性。（四）改善军民关系。（五）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

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这篇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题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1957年4月27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请你们注意，对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要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三、4月28日

1935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会议上发言。发言指出：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1938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谈到我们对艺术应持什么观点时指出：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不管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

当然，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有消极的、复古的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谈到艺术作品要有内容时指出：艺术作品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艺术作品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要贴近实际生活。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装在艺术作品中，是不会受欢迎的。谈到如何造就伟大的艺术家时指出：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这三个条件，即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像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有力地表现丰富的内容。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1949年4月2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电报就稳住汤恩伯及外交对策问题指出：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个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美、英军舰已由上海撤至吴淞口外。英、美采取此种态度于我有利。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

侨民) 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 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 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 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 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 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1956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时指出: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 “百家争鸣”, 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 春秋战国时代, 百家争鸣。讲学术, 这种学术可以讲, 那种学术也可以讲, 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 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谈到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时指出: 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 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 应搞到什么程度, 请大家注意研究。一类是生产过程的企业, 一类是流通过程的企业, 这些企业要有点“独立王国”。这里的所谓“独立王国”, 是说要有半独立性, 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如果因为反对独立王国就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 没有一点自主权了, 那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关于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 中央要设多少部门, 它们有多大的权力, 地方有哪些部门, 管哪些事, 有多大权力, 恐怕在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搞出一个草案来。

四、4月29日

1939年4月29日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 我们的口号是长期抗战。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 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 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办法, 有它的积极意义——动员全国一切力量, 对抗日本帝国主义, 争取民族解放; 同时也有消极意义的方面——可能被坏蛋利用为压制革命势力。我们的任务, 是发扬它的积极方面, 防止和阻止它的消极方面, 使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 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 就是实践。

1956年4月29日

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时，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谈到团结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时，他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对他们的坏的一面作斗争，而且还给他们利益，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谈到与其他阶级阶层的联盟时，他指出：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用这种办法，可以把敌人变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与本国少数亲帝分子。对我们来说，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为了这个革命目的，党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在国际上也一样。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就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力量。最后，他强调指出：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参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抄经验是要吃亏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成功的经验在一国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国如果一模一样，不改变形式，反而会导向失败。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980年4月29日

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台制片主任鲍利等的电视采访时，谈到中国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对外政策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发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

1983年4月29日

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率领的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提出，各国共产党应根据各自的国情确定革命道路。他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的，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他谈到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的任务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五、4月30日

1931年4月3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反“围剿”问题。毛泽东就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作主报告。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否定了“分兵退敌”的主张。会议认为，目前全国革命形势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第二群众好，第三地势好。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完全可以以少胜众的。会议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红一方面军自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1945年4月30日

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报告系统地回顾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必须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认识清楚。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队伍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甚至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队伍要作严格的区别。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司令官即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这篇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

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这三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二十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在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以后，决定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议，即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暂不向江南出动，集中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

1949年4月30日

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斥责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并向人民解放军发炮攻击的暴行辩护的言论。声明指出：中国的领

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篇声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52年4月30日

周恩来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总结。总结指出：外交工作要分清敌我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世界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因此，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总结强调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总结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81年4月30日

邓小平会见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时，阐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和对战争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一个国际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对战争的看法还是那三条：一、战争的危险始终严重存在；二、经过努力，主要是建立国际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战争是可以延缓的，可以争取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三、尽管我们判断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对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目前我们很穷，但也得加强国防建设。

1987年4月30日

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阐述了中国“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他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

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已经过去的八年多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

六、5月1日

1922年5月1日

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文章提出要注意劳工的三件事，即生存权、劳动权和劳动全收权。指出：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文章强调：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劳动全收权自然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为这实是世界上最有了的一个大潮流。劳工的三权问题无论怎样不注意，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39年5月1日

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毛泽东在《解放》第七十期发表《五四运动》一文。文章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各个革命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的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

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文章还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和民众相结合，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46年5月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练兵的指示。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三个月来各地练兵工作抓得不很紧，没有造成热潮，有的练了，有的没有练，此种现象应即刻检讨改正。接此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

1948年5月1日

毛泽东致信李济深、沈钧儒。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

1949年5月1日下午

毛泽东从香山双清别墅乘车到颐和园，前往柳亚子住处益寿堂访柳亚子，谈诗甚畅，随后一同乘船游览昆明湖。在交谈中，柳亚子说：今天胜利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我们都很清楚，蒋介石早晚是要垮台的，因为他们腐败无能，太不得人心了。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一百万军队渡江，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

七、5月2日

1928年5月2日

毛泽东在永新县城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提出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报告还汇报了以永新为中心深入开展工作的策略：对内建立军队的党组织和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

1937年5月2日—14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张闻天致开幕词指出：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而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取得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目前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成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性，报告指出：这是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政治领导的问题，报告指出：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在八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我们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是为了把革命车轮推进一步。关于民主问题指出：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关于革命前途问题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既反对尾巴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和力争的。关于干部问题指出：要完成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关于争取千百万群众的问题指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分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42年5月2日—23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表讲话，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五月二日讲话时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讲话指出：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

军队，但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还要注意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的问题。

朱德在五月二十三日针对会议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发言指出：文艺工作者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我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

毛泽东在同一天作结论报告。结论分为五个部分，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他指出：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一）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立足点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二）关于如何去服务，也就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中国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和提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三）关于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党的文艺工作者

应当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四）关于文艺批评问题。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五）关于对文艺工作者的希望。希望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毛泽东的讲话和结论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

